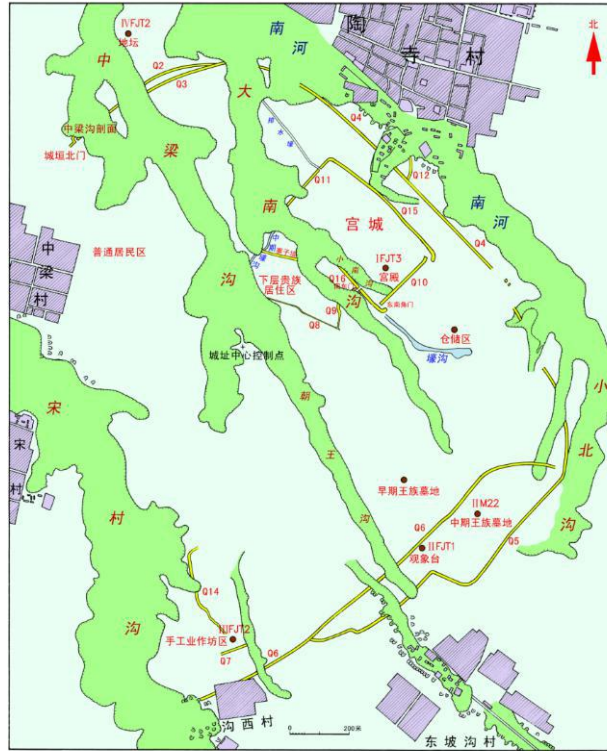


关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几点思考

何弩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是指 1978~1985 年发掘的大型墓地，位于陶寺宫城以南 600 米处（图一），钻探总面积约 4 万平方米。



图一 陶寺城址平面图

该墓地经钻探估计墓葬大约近万座。实际发掘 4926.76 平方米，在发掘区内发现墓葬 1379 座，清理 1309 座。其中一类大型墓葬相当于王墓仅有 6 座，均属于陶寺早期¹，因此我们称之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以便同陶寺中期外郭城东南部外城内的“陶寺中期王族墓地”向区别。《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刊布了早期王族墓地完整的考古发掘资料（以下简称《陶寺报告》），成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早期王族墓地相关问题的基础。笔者通过研读《陶寺报告》，对陶寺早期王族墓地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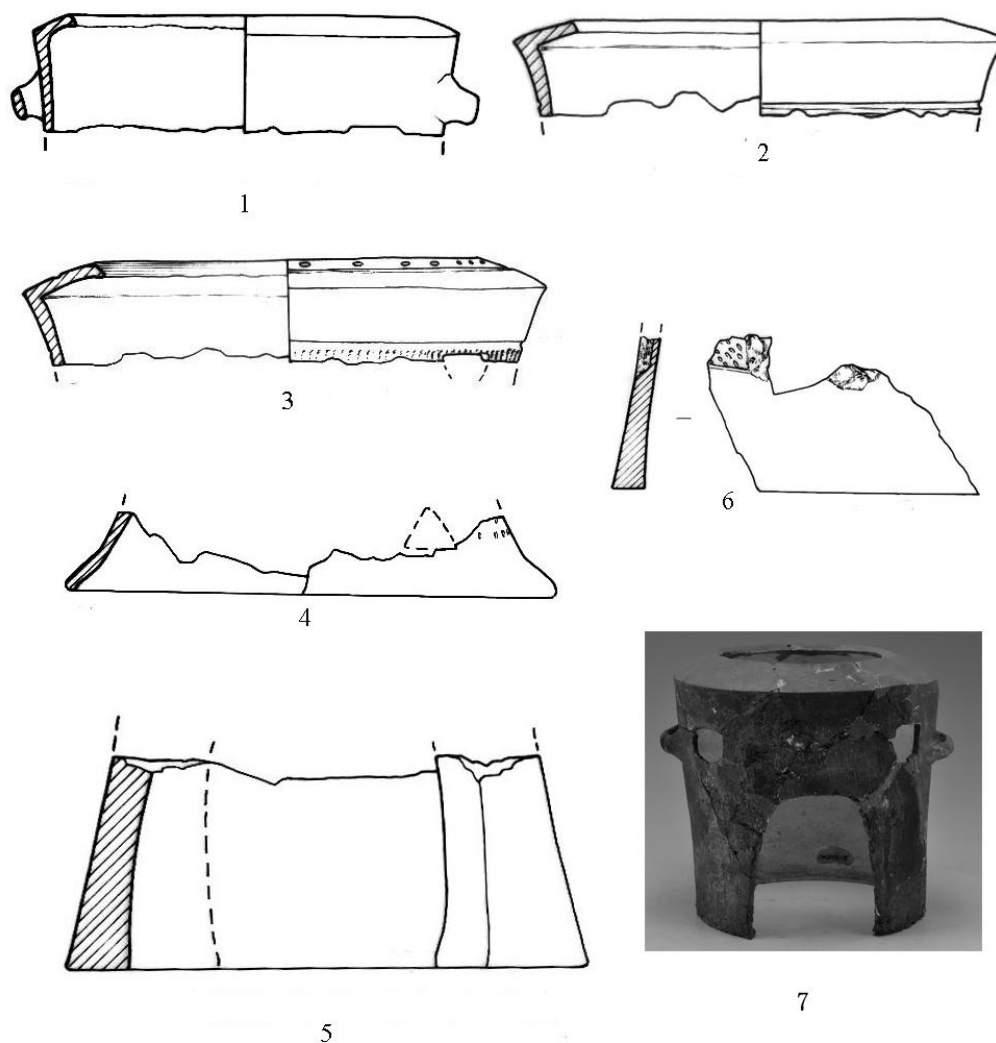
《陶寺报告》将早期王族墓地定性为家族墓地，使用时间为陶寺早期和晚期，未能分辨出中期墓葬。其中绝大部分墓葬不出随葬品，给分期断代带来极大困难。《陶寺报告》根据 42 座出土陶器墓的器物类型学分析组合，分为六组，一至五组为陶寺早期，六组为陶寺晚期²。没有能够辨别出来陶寺中期的墓葬。然而，陶寺遗址居址是早、中、晚期连续的，陶寺早期王族不可能只在早期和晚期死人，中期不死人。实际上，自陶寺中期开始，早期王族失去统治陶寺政体的王权，整个家族社会地位败落，绝大多数人沦为普通居民，因而该墓地里的中期墓葬应该隐藏在那些无随葬品、没有地层叠压关系的墓葬中，无法分辨出来。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391~392 页。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873~904 页。

另一方面，由于 1978~1985 年陶寺遗址发掘，在居址中遇到的陶寺中期遗存很少，当时对于陶寺中期陶器的特征形态认识十分有限，也造成了判断中期墓葬的困难，即便是极少数陶寺中期陶器墓，也因对中期陶器特征把握不全面，而难以辨识。

1999 年至今，随着陶寺遗址持续发掘，陶寺中期遗存大为丰富，使得我们对陶寺中期陶器形态特征的认识大大加深，重新审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陶器墓中，是否能够辨识出陶中期的墓葬成为可能。



图二 陶寺遗址出土中期圈形灶

1. AI 式 IH3⑧:3 2.AII 式 IH42②:1 3.AII 式 IH38⑦:2 4.AIII 式 IH9:1 5.BI 式 IH3:2
6.BII 式 IH42⑤:9 7.M3016:15

1. M3015 的年代再辨析

《陶寺报告》将 M3015 归入陶器第五组，时代也是陶寺早期。与之同组的还有 M3016 和 M3002。M3015、M3016、M3002 均属于一类甲型墓即王墓。随葬陶器中盆形罍、折腹罍、单耳罐形罍、单耳加砂小罐、大口罐、折腹罐、小口高领罐、彩绘陶壶、彩绘陶瓶、龙盘、陶鼓等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唯独 II 形灶（图二·7），矮筒形，敛口折肩，灶腔内不再

设算架圈，以敛口形成肩圈口代替算架³，可称之为“圈形灶”。这类圈形灶，出土数量不多，主要出自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宫城内的陶寺早中期灰坑废弃堆积内。形制特点为釜灶的拆分，仅用灶圈。夹砂灰陶，手制，口部磨光。可分大、小两型。

A 型 小型圈形灶，口径多在 25 厘米左右。早期偏晚出现，中期偏早仍较常见，晚期偏早消失。变化趋势为灶圈算由窄便宽，灶圈算内折趋平，折肩趋锐折，折肩下腹壁由斜直趋斜收。据形制变化可分 3 式。

AI 式 IT3402H3⑧:3，斜方唇内敛，窄沿灶圈算向内斜折形成折肩，直腹壁部斜直。折肩下有一对桥形耳。灶圈和上腹部素面磨光。口径 23、残高 7.6 厘米（图二·1）。

AII 式 IT5126H42②: 1，斜方唇向内敛，宽沿灶圈算向内折近平，形成锐折肩。折肩下部腹壁段斜收，下接直腹壁段。灶圈面、肩下腹壁段素面压磨光，直腹部段顶部有旋纹。口径 24.5、残高 6.1 厘米（图二·2）。

IT5126H38⑦: 20，斜方唇向内敛，宽沿灶圈算向内折近平，形成锐折肩。折肩下部腹壁段斜收，下接直腹壁段。灶圈直壁段顶端有气孔，宽约 3.2 厘米。灶圈面口沿处饰一周戳印圆圈纹，由一道凹旋纹界定。折肩部分、肩下腹壁段素面磨光，直腹部段顶部有凹旋纹，以下饰绳纹。口径 25、残高 6.6 厘米（图二·3）。

AIII 式 IT2017H9:1，仅残留灶圈足，大喇叭口，微盘口，尖圆唇，壁斜直。接近口部饰篔点纹条带间三角形镂空。底径 32、残高 5.2 厘米（图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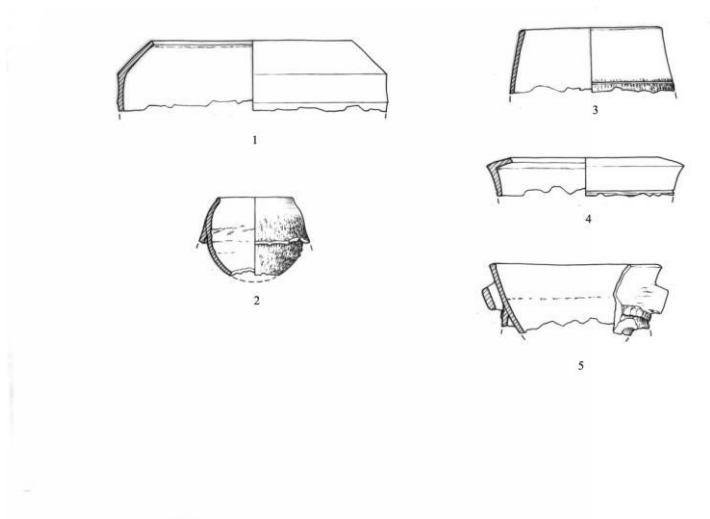
B 型 巨型灶圈，仅发现灶门圈足段残片，底径在 30 厘米以上，加粗砂灰陶，陶胎厚 2.8~4.4 厘米，十分厚重。灶圈外壁经磨光处理，制作非常考究。部分残片内壁保留涂抹的细泥层，被烤成红色，厚约 0.3 厘米。变化趋势为圈足壁从外撇到斜直。据圈足口部形制变化可分为 2 式。

BI 式 IT3402H3:2，大喇叭口圈足底，方唇。口部内缘向内敛，加大灶圈足底部接触地面面积，使灶圈放置更稳。灶门复原轮廓圆角呈倒梯形。胎体很厚，明显由两层厚 1.5 厘米的泥片贴塑成型。器内壁敷一层草伴泥，厚约 0.1 厘米，被烤成浅橙色，烧烤程度不甚。圈足底部使用磨痕不明显，表明该器并非经常使用。器外壁通体素面压磨光。圈足底径 34、底厚 4.7、腹壁厚 3、残高 13.7 厘米（图二·5）。

BII 式 IT5126H42⑤: 9，斜直口，圈足壁斜直，方唇。圈足壁偏下部有大型桥形耳，长约 14.8 厘米。陶胎由内芯体壁内外夹贴泥片制成。器内部敷一层粗泥，厚约 0.1~0.3 厘米，被烤成橙色，烧烤程度不甚。圈足底部使用磨痕不明显，表明该器并非经常使用。圈足直壁中部饰戳印篔点纹条带，由凹旋纹界定。篔点纹条带以下至圈足口沿底部为素面压磨光。圈足底径 34、底厚 3.3、壁厚 2.2、残高 16.4 厘米（图二·6）

据地层叠压关系和灰坑堆积包含陶器分期，IT3402H3 时代为早期偏晚，AI 式圈形灶与 M3016:15 圈形灶形制相同（图二·7），据此推测 M3016 时代为陶寺早期偏晚，略早于 M3015。IT5126H38、IT5126H42（图三）均为陶寺中期偏早，AII 式圈形灶与 M3015:28 圈形灶形制相同。IT2017H9 为中期偏晚，AIII 式圈形灶圈足外撇比 M3015:25 圈形灶要甚，因此略晚于 M3015:25 圈形灶。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557 页，图 4-90·5 和 7。



图三 IH42 出土部分陶器

1.敛口瓮 IH42④:6 2.釜灶 IH42②:2 3.圈足瓮 IH42④:5 4.圈形灶 IH42②:1 5.釜灶 IH42④:4

综上所述，陶寺早期王墓 M3015 绝大部分陶器均为早期特征，仅 II 型圈形灶频见于陶寺中期偏早灰坑中，故可大致推断早期王族墓地第五组陶器墓时代为陶寺早中期之际。

2. M2384 年代再辨析

M2384 出土陶器，被《陶寺报告》归为第六组墓，时代为陶寺晚期偏晚。但是，我们检索其出土陶器，认为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型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一致，应归为陶寺中期。

M2384 壁龛中随葬的小口折肩罐 M2384:2，大斜敞侈口，尖圆唇内凹形成一道凹槽，溜肩下折，下腹急收。这样的小口折肩罐，不论在中期还是晚期居址中都未见完全一样者。因而有必要将其放在陶寺早期到晚期小口折肩罐形制变化逻辑序列中来排比认识。

根据前文分析，M3015 年代为陶寺早中期之际，那么 M3015:29 小口折肩罐形制应代表陶寺早期最末阶段的典型形制，小喇叭口，短颈，广折肩偏上，深腹斜收，小平底（图四·1）

陶寺中期中型墓 IIM26:1 小口折肩罐，小口平折沿，颈部加长略直，溜肩，折肩处下移，下腹变浅（图四·2）。显然是由 M3015:29 小口折肩罐发展而来。



图四 陶寺早期偏晚至晚期偏早小口折肩罐形制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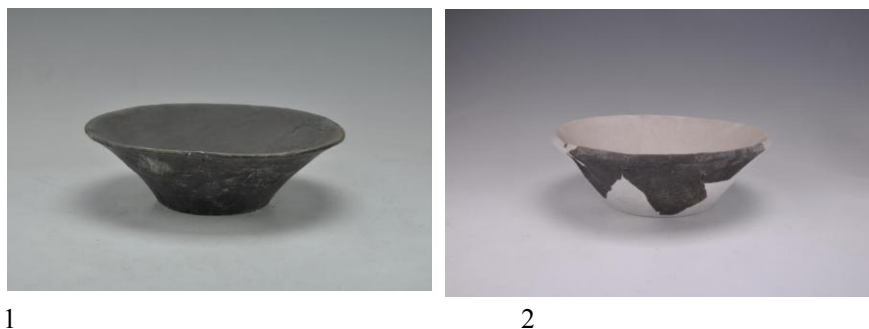
1.M3015:29 2.IIM26:2 3. M2384:2 4.IH6①: 35

M2384:2 小口折肩罐，肩腹特征与 IIM26:1 十分接近，唯口沿变为内斜折略显凹槽状，

导致颈部趋向斜侈口（图四·3），初现晚期侈口特征。

IH6①：35 小口折肩罐系陶寺晚期偏早典型形制，在陶寺晚期居址内大量出土，肩腹变化不大，最大变化在于口部，斜直领直接变为斜侈口，折沿消失变为尖圆唇（图四·4），形制晚于 M2384:2。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M2384:2 小口折肩罐形制晚略于 IIM26:1，早于陶寺晚期偏早典型 IH6①：35，时代应定为陶寺中期。



图五 M2384 和 IH42 浅腹盆对比
1.M2384:5 2. IH42③：19 浅腹盆

M2384:5 浅腹盆斜敞口（图五·1），在陶寺晚期居住几乎不见，与陶寺中期偏早 IH42③：19 浅腹盆形制更接近，唯后者胎略厚（图五·2），似要比前者略早，因而 M2384:5 时代也大致为陶寺中期。



图六 M2384 和 IIM26 双耳罐
1. M2384:4 2. IIM26:5

M2384:4 双耳罐（图六·1）在陶寺中期和晚期居址单位中均未发现完整者，仅在原 III 区居址采集到一件小双耳罐⁴，已无法判断时代。目前仅能根据其形制特征同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型墓 IIM26:5 双耳罐十分接近（图六·2），暂且判断二者年代比较接近。

通过上述陶器形态学分析，大致可以判断 M2384 应为陶寺中期墓葬。然而，《陶寺报告》将其判定为陶寺晚期偏晚更关键的证据是 M2384 填土内有陶寺晚期偏晚典型的肥足高、扁壶、小口折肩罐残片。但是，《陶寺报告》称 M2384 被一未编号兽洞自墓口至墓底，又从壁龛顶部穿出，扰动范围长 1.46 米，宽 0.98 米。而 M2384 口长 2.43、底长 2.7 米，兽洞扰动长度占该墓室长度近一半；该墓室口宽 1.02~1.04、底宽 1.26~1.3 米，兽洞扰动宽度几乎与墓室等宽。M2384 墓主女性 35~40 岁，骨架胸腹部被扰动，双手和双足骨骼被扰失⁵。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陶寺报告》所称的 M2384 未编号兽洞，实际上就是陶寺晚期偏晚的

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240 页，图 3-66·14。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499~500 页。

扰墓坑或扰墓洞。M2384 规模为三类墓，长 2.43~2.7 米。宽 1~1.3 米，除随葬彩绘陶小口折肩罐、双耳罐和陶浅腹盆外，还随葬了大理石钺一件，右臂戴软玉琮式镯一件，墓主显然可以归入小贵族行列，因此在陶寺晚期同样遭到捣毁。所谓填土中陶寺晚期陶片应当是扰墓坑带入的，并非 M2384 下葬时填入的。

陶寺中期王族墓地有所贵族墓葬全部在陶寺晚期遭到大规模政治报复式的捣毁⁶。陶寺早期王族墓地贵族墓葬，在陶寺晚期政治报复式捣毁运动中，也未能幸免于难。《陶寺报告》中所谓的特殊葬俗和被扰动墓葬中⁷，有很多都是遭到捣毁的结果。所谓兽洞 D2002 竟然连捣 7 座墓葬，又挪尸骨，又砸陶器，又搬陶片，显然不是动物行为，应系人为。高江涛先生进一步指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 5 座一类甲型大墓，在陶寺晚期全部被有意识地捣毁⁸。因此，M2384 也在陶寺晚期遭到捣毁，扰墓坑里带入陶寺晚期偏晚陶片便不足为奇了，并不能作为判断 M2384 年代的关键证据。正如芮城清凉寺墓地第三期墓葬 M269 扰墓坑里出土的陶寺晚期偏早鬲⁹，不能用以判定相当于陶寺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¹⁰的 M269 为陶寺晚期偏早。

另外，与 M2384 同为第六组的 M3419，也遭到陶寺晚期 G3002 或 H3036 捣毁¹¹，所谓填土中陶寺晚期的鬲、高领罐、扁壶残片，也很可能是扰墓坑带入的，同样不能作为判定 M3419 为晚期墓葬的依据。

准此，《陶寺报告》所谓的早期王墓地内第六组陶器墓包括五类墓 M2061 和 M2064，年代大致可以定为陶寺中期。当然，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里，陶寺中期墓葬绝不止《陶寺报告》所称的第六组 4 座陶器墓，其他的中期墓葬因不随葬陶器而无法辨认。不过，《陶寺报告》也曾通过墓葬填土陶片大致判断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里，有 9 座疑似中期墓葬¹²。基于陶寺墓地扰墓现象皆出现在陶寺晚期，那么疑似中期墓葬填土中的中期陶片大致是可信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陶寺早期王族墓地最辉煌的时段即掌权的时段为陶寺早期，掌权时期结束于陶寺早中期之际，最末代王即 M3015。陶寺中期开始，早期王族的后裔依然存在，仅有极个别的族人如三类墓 M2384 和四类墓 M3419 墓主还保留小贵族地位。该族其余陶寺中期的墓主，皆沦为普通平民。值得注意的是，M2384 和 M3419 的墓主皆为女性，其地位为何高于同期的男性墓主，背后原因耐人寻味。鉴于 M2384 随葬陶器和玉器形制，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贵族墓同类随葬品高度一致性，我们推测这两位女性因同中期王族关系密切，才“沾光”有了小贵族般的地位。换句话说，陶寺早期王族的后裔，在陶寺中期时的社会地位，取决于陶寺中期王族对他们的态度。

基于上述分析，三类墓 M2384、四类墓 M3419、五类墓 M2061 和 M2064 属于陶寺中期，那么陶寺晚期，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没有一座三至五类墓随葬陶器，但可以随葬玉石礼

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 年 9 期。

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 年 5 期。

何努：《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 年 9 月。158~171 页。

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423~443 页。

⁸ 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7 年。345~354 页。

⁹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队，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上），文物出版社，2016 年。291~292 页。

¹⁰ 何弩：《〈清凉寺史前墓地〉读后》，《中国文物报》2017 年 9 月 5 日第 6 版。

¹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1063 页，续表 4-56。

¹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863~872 页。

器，甚至三型甲类 M3296 随葬了弥足珍贵铜铃，也无陶器¹³。个中原因，也十分值得深思。

3.M3231 人牲再认识

《陶寺报告》称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人牲迹象仅有两例，其中 M3231 比较明确，M1410 疑似为人牲，不能完全排除扰入的可能。人殉人牲的有无，关系到一个考古学文化丧葬制度、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的判定，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具体说陶寺文化究竟是否存在人殉人牲，是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总体上说，陶寺文化不流行人殉人牲，这是有目共睹的。唯一一例人牲 M3231 便非常值得深究是否确凿无疑。

《陶寺报告》将 M3231 定为三类甲型墓葬，根据填土内的陶寺晚期鬲、高领罐、扁壶残片将其定为陶寺晚期¹⁴。据描述，M3231“用考究的四柱式木棺，墓主为 56 岁以上男性，骨殖凌乱不全，存头骨、部分脊椎和肋骨、盆骨及残断的长骨，似半腐状态下捡回，又经火烧烤后连同木炭、烧土一起入棺，棺壁有烧灼痕迹。距墓口 0.56 米深填土中，有一 35~40 岁女性骨殖，头骨反折在胸部，肢骨缺失严重，显系非正常死亡，乃用刑后杀害或活埋于填土中。¹⁵”

根据《陶寺报告》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推测 M3231 在陶寺晚期同样遭到政治报复式捣毁，由于扰墓坑几乎等于墓坑，因而田野发掘中很难辨认出扰墓坑。我们在 2002 和 2005 年清理陶寺中期王族墓地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辨别这类扰墓坑的难度。M3231 不仅遭到彻底捣毁，半腐状态的墓主尸体被扯烂，而且连棺带尸体残块一同被焚烧。扰墓坑回填时，在距墓口 0.56 米处，埋入从其他捣毁墓中拖出来的半腐状态的女尸，以压胜巫术的形式，对 M3231 进行亵渎。这种政治报复压胜巫术行为，我们在发掘清理陶寺中期王族墓地大中型墓时，发现极为普遍¹⁶。

尤其可兹对比的是陶寺中期王墓 IIM22 被陶寺晚期扰墓坑 IH16 严重捣毁，IH16 第③层填土中，距墓口 1.4 米处，埋入一具男性青壮年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躯体在腰椎位置 180°翻转，并呈 V 字形放置，后脚跟翻至臀部，显然是在半腐状态下扔入的。IH16 扰坑底部散布着 5 个人颅骨。发掘之初我们曾认为 IH16③层男性人骨架为人牲或人殉，坑底 5 个人头骨为殉人残留¹⁷。2005 年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型墓清理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种压胜巫术式的政治报复行为¹⁸，纠正了以往对 IIM22 人牲和人殉的错误认识。经过如此分析，陶寺早期王族墓地 M3231 女性人牲需要打个大大问号。而 M3231 判定为晚期的填土陶片关键证据也是需要存疑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陶寺文化存在人牲人殉现象。这一点同石峁城址¹⁹和清凉寺墓地²⁰的人牲和人殉，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应当隐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值得深究。

¹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1052 页，续表 4-56。

¹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1047 页，续表 4-56。

¹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 年。433 页，

¹⁶ 何弩：《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 年。235~241 页。

¹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 年 9 期。

¹⁸ 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 年 5 期。

¹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 年 7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杨湾、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考古》2015 年 5 期。

²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队，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中），文物出版社，2016 年。653~654 页。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项目“陶寺遗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项目资金支持。

（原文发表于《三代考古》（八））